

语言相对论研究的一部新 ——评《语言差异与思维习惯》

贾洪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所, 北京 100089)

摘要: 语言相对论自清末传入, 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酝酿, 终于在 1980 年代后期得以蓬勃发展, 但大多局限于理论阐述或翻译引进, 而无实质性的实证研究。近来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基于汉英名词数概念差异试验的专门著作, 颇为可读。

关键词: 语言相对论; 语言差异; 思维习惯; 数范畴; 认知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我最近在茶余饭后读了一本新书——《语言差异与思维习惯: 英汉名词的数范畴差异及其认知影响》, 系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杨朝春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 由知识产权出版社于 2009 年出版。

一、构架与内容

从内容看, 该书由序言、主体(语言相对论研究历史回顾、汉英名词数范畴比较、英汉名词数范畴差异的认知分析、假设及试验和关于语言相对论的进一步反思)、附录(三项式试验有关图像和数据、七项组试验有关图像和数据、汉语组 2 受试名词数标记敏感性测试材料和四组受试背景调查表)、参考文献和致谢五部分组成。

序言由杨老师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姚小平所写, 阐述了汉英语言结构的差异, 回顾了西洋传教士关注和研究汉英语言结构的历史, 阐明了做类似研究的重要性。

该书第一章主要从国外早期研究(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国外中期研究(人类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领域)、国外近期实证研究(反事实假设、儿童名词习得、名词数标记、即时思维、名词的语法性、空间方位、英汉时空隐喻词的研究等)以及国内相关研究和评论(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的早期述评、哲学角度的思索、文化语言学方向的研究和社会语言学领域内的探讨和研究)四方面给予总括性的梳理和评述。

该书第二章主要由汉语量词结构、英语“表份结构”(不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复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和单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汉英量词结构比较、英语名词复数标记和汉语复数标记及其与英语复数的比较等五方面, 阐述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数量方面的异同。

该书第三章主要由关于量词的认知解释、量词的认知意义、复数标记的认知解释和复数标记的认知影响等四方面, 讨论英汉两种语言有关量词和复数标记的认知解释和影响。

该书第四章主要由理论假设、三项式物体分类试验(试验目标、试验物、试验对象、实验步骤、试验结果及数据分析和讨论)、七项式物体分类试验(试验目标、试验物、试验对象、试验步骤、试验结果及数据分析)、讨论、总结和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等六方面, 探讨物体分类试验和实证研究的问题。

该书第五章主要由语言相对论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及语言相对论的时代意义两方面探讨语言相对论需要攻克的难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对论研究对语言文化的理解、政治经济全球发展的预期贡献等的重要性。

二、学科意义

语言相对论的学科术语是沃尔夫于 1940 年代提出的, 标志着这个学科의 正式诞生, 但语言相对论的现象是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而产生, 语言中隐喻的现象可作为例证, 而有关语言相对论思想的阐述也一直零散地存在于各种有关语言的论述之中。有人认为, 语言相对论思想的论述始于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于 1840 年代的相关论著, 但在分析苏格兰语言学家亚当·斯密有关语言结构始成的论文《有关语言始成的思考》(1761) 时, 我发现在

该文中亚氏业已涉猎有关语言相对论的主张，比洪堡特早了近80年。

早期语言相对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现象的探讨，旨在发现不同语言对认识世界以及世界结构构成对语言构成所产生的制约和影响，大多局限于语言现象的推理，而随着哲学实证的出现，语言相对论的研究逐渐地以试验数据的分析为基础验证语言对于认识世界和世界结构对语言产生影响的假设，旨在找出不同语言类型差异的根源。

《语言差异与思维习惯》就是以试验数据为基础，验证汉英数范畴差异对人类认知造成相对假设的著作。该书作者经过四组试验分析后得出自己的语言相对论结论，指出语言相对论的症结与解决该问题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指出语言相对论理论对缓解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局面中的紧张局面。就今年国内语言相对论研究的状况而言，该书可算作是一部力作，开启了语言相对论的实证研究，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关于该书所具有的优点，读者都看得到，我不必多言，下面主要说说我在阅读该书时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我自己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

三、问题发现

通读该书，我本人做了如下思考，全当是自己就该书所提出的问题，记录如下：

其一，该书主标题“语言差异与思维习惯”简洁易懂，副标题“英汉名词的数范畴差异及其认知影响”细化了该书的内容焦点，但略显冗长且易于产生歧义：是“英汉名词的数范畴差异对认知的影响”，即人对认识世界的影响，还是“英汉名词的数范畴差异及其认知的影响”，即人认识英汉名词数范畴差异的影响？此外，副标题中的“英汉名词”是否意在突出以英语为参考系从事该项研究？通常，汉外对比研究都是以汉语为参照系研究汉外语言的差异问题，这也是自1957年吕叔湘先生一直所倡导的。

其二，副标题以“英汉名词”为序，该书第一章也是以“英汉”为脉络评述“英汉时空隐喻词研究”的，而在该书第二章却以“汉英”为序阐述“名词数范畴”问题，是否意味着该研究中语言参考系发生转换？如此转换是否会打乱对比分析的基础？是否对最终得出的结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三，国外早期的语言相对论研究并非始自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等人。有人认为，语言相对论思想始于德国洪堡特在1840年代有关语言的著述，但亚当·斯密在论述数字名词始成时，他认为，“在社会初始阶段，人类所能关注到的数字区分，可能只有‘一’、‘二’和‘许多’”，“我曾了解到，有些原始种族的语言只能表达前三个数字”（参见1985：187-8）；在阐述动名词的屈折变化和关系与品性时，他认为，动、名词词根的屈折变化与世界的结构相对应，其相对应的关系和品性与客体不可分割，其行为和施动者与事件不可脱离。可见，亚氏业已有所论述，只是未能形成学科名称。

其四，作者认为“国内对语言相对论思想的介绍始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是民族语言学界通过翻译苏联学者的文章引进的”（2009：55），这一观点与语言相对论思想传入中国的事实略有不符。清末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2）业已出现语言相对论思想的萌芽。

其五，作者在论述“汉英复数标记比较”时认为“在英语这样的非量词语言中，名词的可数性特征一般体现在词法上，而在量词语言中一般体现在名词短语的句法-语义结构上。英语名词有一个常用复数标记‘-s’，而汉语的普通名词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标记来区分单复数”（2009：81）。上述引文中，作者认为，汉语是量词语言，不知如何界定量词语言？如果是汉语是量词语言，量词必然成为这一语言的主要特征，而量词也未必构成汉语的主要区别性特征吧？古汉语并没有近代汉语那么热衷于量词的使用，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数词“三”之后的“人”并非量词；“飞流直下三千尺”中数词“三千”之后的“尺”也并非量词。其次，英语名词的复数体现在“词法上”是否确切？汉语没有词法么？确切地说应该是名词的形态变化或曰屈折变化，这是汉语所没有的。最后，作者认为“汉语的普通名词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标记来区分单复数”，其问题在于：汉语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标记，英语也没有，否则汉语的复数就无需采用词汇手段来表达了，而是采用屈折变化手段了。这里是否改成“具有西方语言的语法标记”或“具有屈折变化的语法标记”会更达意？此外，“无界物是连续体，不可数，如果汉语量词确实具有区分概念上的有界和无界的作用，可以进行语义分割，那么可以推测，凡是带量词的汉语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在概念上都是无界河不可数的”（2009：89）。这一言论是否过于绝对？

其六，在论述复数标记时，作者认为，“一个事物在语言中是否可数的前提是它有没

有便于计数的预设单位 (presupposable unit)。英语和汉语复数形式的差异与词汇基本语义结构的隐性差异相关。许多英语名词可以直接被数词修饰,自身能作屈折变化表达复数概念,这表明它们包含着一种预设单位,这是其内在意义的一部分(见 Lucy 1992b),而汉语名词则没有,因为汉语名词需要借助量词来实现单位化”(2009: 93)。上述引文中,作者疏忽了一点,汉语虽没有自身屈折变化表达复数的手段,但存在可直接被数词修饰的现象,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四人一组,两两结合”、“四死三伤”(很独特的表达)、“五鼠闯东京”,等等。这些表达法有的是近代汉语的新创造,有的是古汉语的遗留,数量虽不占主流,但不能说没有,所以说作者的“汉语则没有”的否定只对了一半。

其七,作者在追溯汉语量词结构时,引用了王力(1990)和石毓智(1998)的考察的成果,都是笼统的概括,没有具体到哪些文献,如果能具体指出哪些文献可能贡献更大,至少我是想读到这些文献的。

最后,该书也同当前大多出版物一样,存在几个错别字,即第47页的“中”应为“种”,第48页的“白”为多余字,第142页的“萨皮尔”应为“萨丕尔”(同目录,且后者为当前通用名),第144页的“门”应为“们”,等等。

四、结论

该书以实验数据分析位基础探讨语言相对论问题,是国内目前少有的,也是该书的最大亮点和贡献,是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本文“问题发现”部分所占篇幅略多,但并非说该书问题多多,而是该书的优点和亮点读者都能发现,我则选择得罪人的工作,专门探讨了“碧玉”之“瑕”,不免令人生厌。

参考文献

- [1] Smith, Adam.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 and the Different Genius of Original and Compounded Languages [J]. The Philological Miscellany (Vol. I), 1761: 440-79.
- [2] Smith, Adam.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M]. J. C. Bryce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5.
- [3] 胡以鲁. 国语学草创[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2.
- [4] 杨朝春. 语言差异与思维习惯: 英汉名词的数范畴差异及其认知影响[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A New Star in the Studi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sm --- Linguistic Differences and Thinking Habits (2009)

Jia Hongw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relativism,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eve of Qing Dynasty, experienced long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ame into its maturity in 1980s. However, most works in this field are focu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achievement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not the empirical studies in nature. Recently, a book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number category of nou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as published, which is worth reading.

Keywords: linguistic relativism; linguistic differences; thinking habits; number category; cognition

作者简介（可选）：